

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 生成逻辑、作用机理及显著优势

刘旭雯

[内容摘要]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不懈追求。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从生成逻辑上看,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对马克思主义财富观的继承、是对“先富后富”理论的有效衔接,并成为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力量。从作用机理上看,两者之间的内在耦合性表现在中国特色第三次在弥补分配不足中推动全民共富,在涵养向善文化中促进全面共富,在吸纳社会成员参与中助力共建共富,在不断促进社会公平中实现全程共富。从显著优势上看,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的主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是以人民为中心,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自愿行为;分配制度;显著优势

中图分类号:F01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306(2023)02-0065-09

社会主义的本质明确了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作为推进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环节之一,如何在整体布局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并在时代语境下与人民的利益融合并更好地彰显其利益,是新时代推进第三次分配需要首要解决的问题。本文是基于共同富裕目标下探讨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的生成逻辑、作用机理以及超越性优势,以其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有所裨益。

一、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以实现共同富裕为导向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肯定了过去我们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效,同时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并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1](22)}他在提到如何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中,明确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具体要求。共同富裕的实现离不开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和政策安排。合理的财富分配又是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物质前提。从社会财富的分配内涵上看,包括了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依靠的主要力量分别是市场、政府和社会。

最早出现“第三次分配”这一概念是在1994年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出版的《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一书中提出的。由此可以看出,第三次收入分配实质上是诞生于中国本土的一种理论自觉与创新。在厉以宁教授看来,“在两次收入分配之外,还存在着第三次分配”,^{[2](77)}而所谓的第三次分配,是区别于第一、第二次以财产作为客体的分配,是道德为驱动的、以信念为力量而进行的分配。正如厉以宁强调的,“与个人的信念、社会责任心或对某种事业的感情有关”。^{[2](79)}第三次收入分配的主导是社会机制,是

作者简介:刘旭雯(1990—),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电子邮箱:1114313164@qq.com。

基金项目:本文受到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乡村振兴目标下滇黔桂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推进路径研究”(22XKS001)的资助。

更高形式的价值目标，即需要原则的集中体现，为的是提升弱势群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从涵盖范围来看，第三次分配涵盖了第一、第二次分配以外的其他分配方式。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第一次出现在中央文件是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会议在提及完善基本分配制度时指出，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31(39)]之后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国家“十四五”规划中都多次提及了第三次分配发挥的重要作用。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中指出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需要“完善有利于慈善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体制机制”，^[41(14)]同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在对共同富裕进行部署时再次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9]由此，促进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成了谋划促进共同富裕顶层设计的重要一环。

二、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的理论根基与生成脉络

作为当前实现共同富裕的创新机制，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的出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追根溯源，它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的基础上，与中国共产党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相衔接，并在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和当前发展的客观实际做出的客观选择，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一）理论根基：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对马克思主义财富观的继承

财富创造和分配的过程既集中反映着一个国家的社会形态，也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脉络。^[6]具体来说，人类文明进步的其中一个重要标志体现在财富创造能力的提升和财富分配关系的调整两大方面。马克思在对未来社会进行预测时虽然并未直接提出“共同富裕”这一概念，但在批判资本主义财富的异化中形成了自己的财富观。在他看来，资产阶级“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出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7](234)]回溯资本主义的“发家史”，就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建立无不是在暴力中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而那些落后民族国家和弱者在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中陷入万劫不复，成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牺牲品。在这一过程中，也加剧了弱者和强者在经济利益上的敌对状态，社会由此分化成两个阶级：一个是占据着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另一个是只能靠出卖劳动力勉强维持生计的工人阶级。于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生产过程是这样的：资本家将工人作为“工具”，利用其占有的生产资料支配他们在工厂开展生产劳动，生产结束后工人获得得以维持延续自身劳动力的生活必需品，而创造出的剩余价值则全部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特别是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使得劳动日益趋于简单化、同质化，再加上不断激增的劳动人数，工人受剥削的程度被迫进一步加深，并出现了大量失业人口。由此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动因和结果，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分配方式不可避免地带来贫富差距的扩大。将“改变世界”作为己任的马克思，在尖锐批判资本主义财富中的异化同时，形成了对未来社会分配方式的构想，其基本原则在于实现“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并揭示了未来社会财富利益关系和人类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具体路径：一是通过提升创造财富的能力实现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这是摆脱贫穷普遍化的首要前提；二是财富生产应回到人这一“目的本身”，将财富生产的人和“目的本身”的人合二为一，并由此推动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同富裕是对马克思财富观一脉相承的理论关怀，是以“人”为中心的财富伦理观，为最终走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崭新方案。从当前中国财富创造和分配关系上看，如果说“先富”的提出为的是解决把财富蛋糕“做大”的问题，那么带动“后富”实现“共富”就是在“蛋糕”做大之后解决如何分好的问题。中国

特色第三次分配作为“带动后富”的一种有益补充形式，通过“文明的手”“温柔的手”把人的“自我实现”转变为“自由的实现”，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向着“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阶段迈进。

（二）历史逻辑：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对“先富后富”理论的有效衔接

从历史演进进程上看，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对“先富后富”理论的有效衔接。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历史性伟大成就，创造了继日本之后的又一个东亚奇迹，不仅在经济总量上位列世界第二，而且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30%，同时人民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在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的基础上，人均GDP也实现了从1978年的385元到2020年的72447元的质的飞跃。但与此同时也积累了许多问题，特别是城乡以及城镇、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导致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尤为明显。除此之外，不同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呈现扩大趋势，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仍处于高位，2020年基尼系数达到了0.468，超越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0.4。过去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证明，国家内部各地区以及社会成员之间贫富差距一旦超越公认警戒线，各种潜在的社会矛盾就很容易被激化，各群体之间的对立和不满情绪进一步被激发，就如《不平等的痛苦》一书中英国学者威尔金森指出的，贫富分化的加剧将使“社会上人们的焦虑感就会上升”“毒品的使用情况更为严重”“凶杀案犯罪率更高”^[9]等各种不良社会影响。过去中国之所以能够在高基尼系数下保持相对稳定状态，得益于其改革开放以来高经济增长率及在其影响下的低失业率。但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及GDP增速放缓，过去隐藏在高经济增速下的矛盾相继暴露出来。因此，如何在新发展格局下着重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关乎到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更关乎到党执政之基的巩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多次讲话中反复提及共同富裕，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第一次将远景目标明确为“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0]在党的二十大上又再次重申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目标。共同富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重在解决“后富”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公平分配结果的表现形式。^[11]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正是为实现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孕育而生的，重在运用分配手段解决“后富”以及促进公平正义的问题。先富的地区和个人由于享受到了国家政策红利，因此既有义务也有能力带动后富地区和个人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额外补充，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它通过发挥非政府主体的主导作用和先富群体的示范效应，在抑制收入差距扩大，解决当前分配制度上的缺陷，并在引导财富向善中加快“先富”向“共富”跨越起着重要推动作用。

（三）实践逻辑：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上，脱贫攻坚成为“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随着党中央对贫困治理力度空前加大，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书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上的中国奇迹。2020年11月，随着贵州省紫云县最后一个贫困县的摘帽，不仅标志着我国彻底摆脱绝对贫困，也宣告了我国的脱贫攻坚战正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当前，人民所期待的已经不再是解决温饱问题，而是逐步实现“美好生活”，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机制正式为解决“美好生活”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而产生的，目的是消除两极分化，确保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社会成员。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将财富的绝大部分分给了极少数人”的最重要的体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所在。当然，这里我们说的消除两极分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

裕。”^[9]

立足于新时代和新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坚持将按劳分配这一共同富裕制度保障作为根本原则，聚焦分配制度改革，协同推进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加快推进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形成。初次分配是重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分配方式，表现为将按劳动与按生产要素结合起来的直接分配，在整个分配制度中占据中最重要的部分。再分配是对初次分配的重要补充，表现为政府对国民收入的调节。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将社会公益事业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中，使其成为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伦理道德再分配中的作用，加快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期待和共同富裕的逐步实现。总体来说，中国共产党对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认识的整个过程，是经历了强调效率基础上兼顾“公平”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再向着“兼顾效率与公平”的三次跨越。而新时代坚持效率与公平辩证统一的重要体现也是对第三分配的不断完善。这不仅是我国向着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客观反映，也是我们从实践出发对过去西方将效率与公平作为两大矛盾体主张的突破。^[11]

三、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机理

从内涵来看，共同富裕包含着全体、全面、共建、全程共富四个重要组成要素。^[12]全体共富，是从覆盖群体维度指明共同富裕的全民性；全面共富，是从主要内容维度指明共同富裕是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协同发展。共建共富，是从参与主体维度指明共同富裕的全民参与性；全程共富，是从推进过程维度指明共同富裕贯穿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始终。推进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与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高度契合性。

（一）全体共富：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在弥补分配不足中缩小贫富差距

全体共富体现了共同富裕的普惠性，意味着其涵盖的范围是所有地区、民族和阶层中的每一个人，它的关注点应着重放在对落后地区及其相对贫困人口的覆盖，因为他们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中最薄弱的一环。正如马克思曾经以“房子”和“宫殿”做比喻来揭示社会贫富差距问题，在他看来，只要所有的房子一样小，它就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一旦房子周围存在一座宫殿，它就会“缩成茅舍模样了”。^{[7](345)}因此，帮助脱贫人群解决相对贫困问题，通过“提低”的方式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就成为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尽管由政府主导的第二次分配中，低保、养老、医疗、公共教育等社会保障较好地发挥了预期的作用，但保障水平随着地区的不同差距有着明显区别也是客观事实。^[13]并且近年来我国分配差距依然处在高位阶段，居民收入缩小趋势并不明显。这表明，在推动共同富裕道路上，单纯第一、第二次分配发挥的作用显得“力不从心”。作为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中国特色第三次收入分配可以弥补第一、第二次分配的不足，促进公平与效率的深度融合，在推动地区、城乡之间贫富差距减小的同时实现共同富裕。具体来说，一方面，是通过捐赠的方式将社会上经济条件相对富裕的先富人群及企业将可支配的一部分财富转移到落后地区以及相对贫困群众手上，以此改变当地落后的面貌和帮助当地困难群众改善生存和生活调节，调节因市场机制缺陷带来的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如2010年福建福耀玻璃集团向西南五省市灾区贫困农户捐赠2亿元；为支持广东省实现脱贫攻坚，广东省慈善总会截至2021年6月30日共计拨付了43亿元等。这一过程是先富群体和后富群体财富资源转换的过程，先富群体将一部分财富资源转移给了后富群体，虽然效能有限，但客观上还是起到了助力“提低”的作用。另一方面，经济和生活条件得到极大缓解和改善的后富

群体也能减小过去由于贫富差距拉大和利益分化加剧导致的心理失衡，在让其感受到来自社会帮助的同时，更好调动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消除悲观情绪，实现从外力帮扶到向着内生动力转换，并通过勤劳致富的手段实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进而在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数量中缩小贫富差距。这也是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在推动全民共富中所能发挥的独特作用。

（二）全面共富：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在涵养向善文化中丰富精神文化

全面共富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全面性，强调在满足人民群众对物质层面向往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人民群众在精神层面的需求，实现两手抓、两手都要做出实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多次指出，要“丰富人民精神世界”^[42]“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43]中国特色第三次收入分配在从精神层面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起着重要促进作用，这归功于它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即道德性。孟子曾经指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在他看来，人之初本性都趋向善良。而这种向善，体现在现代就是愿意去帮助他人和做对他人有益的事情。当向善融进文化中时，不仅能够改变人们的认知、表述及行为方式，还有助于实现人民精神世界的丰富，推动社会形成良好的风气，进而加快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从本质上说是依靠精神文化支撑的社会主体的自觉自愿行为，其核心精神内涵是奉献、互助。基于此，我们所强调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不是对高收入者以道德绑架或者其他一些看似“自愿”，实际上强制的手段进行“杀富济贫”，而是通过国家税收政策等一定的制度安排，激励高收入者通过慈善捐赠的方式，将自己的部分收入转移给因各种原因如灾害、不幸、困境等导致收入降低以及失去劳动力的困难群众，以此来对分配结构进行补充。而这一过程也给慈善捐赠者产生了积极效益，具体表现在，一方面是满足了高收入者对精神方面的追求。依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当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时，人民对高层次需求的渴望就会愈加强烈。过去，在生产水平落后的情况下，精神文化需求往往让步于物质需求，而当生产水平得到较快提升后，过去被抑制的精神需求就有了释放的空间。同样，对于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的高收入者而言，他们更希望通过向社会回馈来赢得社会的尊重。另一方面，是有助于个人或企业形象的提升。例如，2021年鸿星尔克公司向河南灾区群众捐赠5000万元这一善举在网络上走红，并持续“霸榜”微博热搜，销售额也由此迅速攀升，实现了其品牌商业价值的快速提高。当然，乐于慈善的社会风气也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国家在推动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的过程中充分利用道德的力量，发挥政策的驱动作用，通过税收优惠、奖励政策以及文化塑造等诸多方面措施，将国家治理与向善的价值观相结合，对于增强人民群众的慈善意识，推进其共同参与到慈善和志愿活动中，形成乐于慈善的风气，实现社会效益最优化并推动全面共富的实现意义重大。

（三）共建共富：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在吸纳社会成员参与中积聚力量

共建共富体现了推进共同富裕主体的多元性。“共建”中的“共”，可以解释为“共同”，这意味着推进共同富裕不是单靠国家或政府的大包大揽，这种“一条腿走路”的方式是很难走得稳、走得长远的。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除了起主导作用的政府外，还需要市场和社会的共同参与，发挥其各自的优势实现协同共治。特别是在后工业时代，公共事务相较于过去显得更加纷繁复杂，单靠国家、市场或者社会中的任何一个进行单线作业都是不现实的，必然要付出高昂的成本。根据帕累托改进理论，只有充分吸收三者的优势，才能降低实现共同富裕成本，实现利益最大化。而这也直接体现在国家分配制度上，从目前的三种分配制度看，第一次分配强调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第二次分配强调发挥政府的力量弥补市场的缺陷，第三次分配则注重吸纳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44]因此，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特色第

三次分配在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在于拒绝“等靠要”“养懒汉”以及“搭便车”的行为，而是通过凝聚社会力量来弥补第一、第二次分配的制度缺陷。第三次分配内生于社会，是社会自发组织起来的互助行为，源于人们的分享本能，承载了对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因此市场和政策对其的影响力较小。特别是随着我国已经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也使更多的社会力量有能力且也愿意去参与到第三次分配，将部分合法财产、物质和服务贡献出来帮助弱势群体。这里我们所说的社会力量，除了高收入人群外，还包括了志愿者、社会组织、企业中的一切成员。而他们在参与第三次分配的过程中能够帮助解决政府难以识别的细节问题，如一部分弱势群体的不富裕除了来自生存环境和自身能力以外，还受到了家庭因素、心理、情感等的影响，而这些恰恰是政府难以调节的。社会力量在对弱势群体进行志愿帮扶的过程中从陌生人变成了知心人，彼此逐步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并且在帮扶结束后在情感纽带的联系下继续维系下去，这不仅能够更精准地去找到不同地区推进共同富裕的难点、痛点，理清真正症结所在，还能更好地对症下药帮助弱势群体，从根处推动全社会的共同富裕。这些都体现了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在吸纳社会成员参与分配中积聚的力量所在。

（四）全程共富：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在不断促进社会公平中推动共富

全程共富体现了共同富裕推进过程的全程性。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告诫广大党员干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需要“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15][15]}不允许产生任何松下脚步的念头。共同富裕既不是绝对平均富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直接富裕，是贯穿全过程的，不同地区的人民需要在不同时空下，分阶段、分批次进入富裕状态。这就如邓小平为打破原有的“大锅饭”模式，摆脱当时共同贫穷落后的局面，根本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时提出了“先富后富”理论，即鼓励一部分有条件、有能力的地区和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方式先行富裕起来，在分配过程中允许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参与，其他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等发展到一定时期后，打好了物质基础的地区和先富者也要顾全大局，理应拿出更多物力、人力、财力去帮助后富地区尽快脱贫致富，以此防止由于收入差距拉大带来的两极分化。归根结底来说，“先富后富”思想的最终归宿是要在促进社会公平中实现共同富裕，它与过去“同步富裕”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其在推进社会公平中的循序渐进性。从主体来说，中国特色第三次收入分配的中坚力量主要来自地理条件优越且经济基础较好的先富地区以及当地先富人民，他们享受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的支持，再加上自身的奋斗拼搏，率先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从客体来说，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需要着重关注的是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落后地区和相对贫困群众，过去他们服从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大局”中的“第一个大局”，这本身也是一种“不公平”，随着我们进入完成“第二个大局”的阶段，即通过一系列精准扶贫措施帮助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特别是落后地区农村人口实现全部脱贫，以此来推动社会公平的逐步实现。但不可否认的是，落后地区仍有一部分相对贫困人口依然在脱贫和返贫的标准线上徘徊，随时都有可能因为疾病、子女教育、失业等因素再次打回原形。因此，强调加快推动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帮扶行为，是将推进社会公平贯穿全过程的“温柔之手”，先富地区的个人、企业、社会组织通过积极参与公益的方式，尽可能以自身财产、物品、服务等方式回馈落后地区的相对贫困群众，同时也从心理、精神上给予关怀，使得的受到帮扶的人员感受到更多的人情味，长此以往对于地区、城乡贫富差距，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缓和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并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方向循序渐进地迈进重要推动作用。

四、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的显著优势

通过对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的历史脉络、作用机理进行分析,不难看出,作为中国式的分配制度,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遵循了不同于西方的分配逻辑。它所展现出的蓬勃生机和强大生命力,反映了与中国国情以及人民群众诉求的内在契合性,在客观上亦是能体现出其相较于西方福利制度的显著优势。这种优势可以具体概括为,以中国共产党作为主导力量,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宗旨以及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最终归宿。

(一) 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的主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的缘起既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也吸收了西方慈善理论。中国传统文化对其影响最深的是儒家的“亲亲”“仁民”和“爱物”思想。“亲亲”是“仁者爱人”的发轫,强调行善的顺序应遵循由近及远,先做到“爱己”修身再“亲亲”齐家。“仁民”强调暨“推己及人”后应更深入地“推人及物”,最终实现仁爱宇宙万物之终极目标,即宇宙万物之间的资源共享。从“亲亲”到“任民”再到“爱物”,形成了环环相扣的逻辑链条,彰显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结晶。^[16]这些思想所蕴含的道德力量都对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产生了深远影响,具体体现在高收入者应“兼济天下”,低收入者应“独善其身”。这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5]〔23〕}同样,西方慈善理论中的将慈善看作公民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并构成了由宗教信仰、社会文化、财税制度组成的“慈善生态圈”,推动慈善组织日益发展成熟,这些都给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提供了有益借鉴。因此,从理论源头上说,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结合中、西而形成的。^[17]但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可以将其简单理解为“古为今用”或“洋为中用”,这是由于它的主导力量始终是中国共产党,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必须要在党委的领导下来继续。正如习近平在多个场合中多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15]〔20〕}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之所以同样需要坚持党的领导,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而非西方慈善主导者那样,其做慈善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缓解社会矛盾之名来掌控更多的社会财富。当然,强调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不是要通过强化管控的方式,用行政代替社会,而是为推动其更好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使其在实现共同富裕的正确轨道上不偏航。历史事实证明,发挥党的领导的关键作用,不仅有利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汇聚社会资源推动公平正义的实现,还能够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推动物质与精神的同步富裕中实现共同富裕。

(二) 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根本宗旨是以人民为中心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既存在与西方福利制度相同的共性,也有区别于西方福利制度的个性。从共性上看,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与西方福利制度都是处于对困难群体的同情或者基于良好社会反馈所产生的相同心理机制,其基本原则都是自愿、自主且非营利性。从个性上看,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不同于西方福利制度的显著区别在于它的“魂”始终在以人民为中心上。^[18]西方福利制度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为拯救经济大萧条而采取的“新政”。而“新政”的目的,是通过社会保障政策、高额累进税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来缓解社会矛盾、缩小贫富差距,以此重新振兴美国经济。这一政策成功后,西方国家相继效仿,国家福利制度由此在西方建立起来。然而,西方福利制度纵使在解决过剩性危机和缩小贫富差距起到一定作用,但它将贫困的原因归咎于贫困者本身而非资源配置不公。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家

抬高工人工资，不过是为了解决社会需求，而是让工人阶级的需要成为资本周转和循环的推动力。这就揭示了西方福利社会的本质。在这种思路下，纵使绝对贫困可以消除，相对贫困也永远无法消除。西方国家最终无法改变“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的资本主义制度定律，共同富裕必然是一个遥远的无法企及的美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的出现必然要求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做好服务，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共同富裕保驾护航，这是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的首要前提。而其背后的理论依据，是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肯定。因为劳动者是“生产力要素中唯一能动的因素”^{[19](105)}是“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20](135)}的阶级，因此明确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的目的和动力所在，那就是“人民性”。事实上，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以体现的关键所在，它不仅实现了生产力和人民标准的统一，也实现了物和人的尺度的统一。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最终目标，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发展社会主义慈善事业，改变财富分配格局，在推动“后富”共同发展中弥合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张力，无论是在脱贫攻坚还是抗击疫情期间，都能看到各类社会组织成员无私奉献地奋战在一线的身影，这些都体现了其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坚守。

（三）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的最终归宿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阐释共同富裕内涵时明确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是“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21]具体来说，共同富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基础，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保障。而这个物质保障除了包括衣、食、住、行等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外，还包括人的交往实践这一类高层次的精神需要保障。在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物化”的社会使得人对精神需要的空间被物质需要所挤占，从而造成人的需求的异化和精神力量的丧失，并日益成为“单向度”的人，这必然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22]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因此我们所说的共同富裕不同于资本主义所谓的“富裕社会”下的人的物化的，我们所要实现的“美好生活”是创造更高生产力的同时充分满足人民对更高精神生活的追求，进而为人的发展创造更广阔的空间。同样，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终极目标作为指引，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本身在制度设计上就与资本主义的福利制度有着根本的区别，是朝着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第三社会形态而推进的一种更高级别的财富分配方式。这正如部分学者所指出的，对于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的认识与理解要“站在比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更高的维度上探寻”，^[23]而不是从经济学的社会、人文和价值理性去做简单的判断。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并不是要在政府与企业、高收入人群三者之间进行博弈，也不是单纯的依靠其中某一方面的力量来推动的，而是旨在提升精神文明和激发社会活力的一种自觉行为，其显著的特征趋向于马克思所描绘的未来社会中高度发达生产力下的按需分配。当然，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本质上是在推进财富升维中实现人的升维的循序渐进的过程，这和社会主义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并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是相呼应的。但我们在向共同富裕推进的过程中，除了要创造更为丰腴的物质财富同时，也不断尝试着将生产与分配主体重新统一起来，而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只有将“生产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使其成为第三次分配的主力军，进而战胜一切强敌，克服一切困难，实现“民众的大联合”，才能真正推动慈善文明这一精神文明形式从自发走向自为。这也是未来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体现。☆

主要参考文献:

-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厉以宁. 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 [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5]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N]. 人民日报,2021-8-18(001).
- [6]陈 新. 马克思主义财富观下的共同富裕:现实图景及实践路径——兼论对福利政治的超越[J]. 浙江社会科学,2021(8):4-10.
-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8]徐 飞. 共同富裕的理念演进、实践推动与基础性制度安排[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22):96-104.
- [9]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 [10]韩喜平,何 况. 中国共产党百年分配制度变革及其人民立场[J]. 经济纵横,2021(5):1-8.
- [11]葛 扬,朱 弋. 分配制度、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J]. 山东社会科学,2022(4):44-52.
- [12]刘旭雯. 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科学意蕴[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40-50.
- [13]江亚洲,郁建兴. 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与机制[J]. 浙江社会科学,2021(9):76-83.
- [14]何 阳,娄成武. 面向共同富裕的第三次分配:机理、条件及路径[J]. 青海社会科学,2022(1):139-146.
- [15]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6]王汉瑛,邢红卫,田 虹,等. 第三次分配:儒道佛思想渊源及融通[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2(3):3-8.
- [17]罗叶丹,邓国胜. 共享理念视角下中国特色慈善理论的逻辑理路[J]. 北京社会科学,2022(2):96-106.
- [18]王 勇. 十九届四中全会解读:慈善无国界,慈善事业有国情,走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之路[EB/OL]. 澎湃新闻,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551879, 2020-1-17.
- [19]萧 前,等. 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 [21]认识把握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N]. 人民日报,2022-5-21(006).
- [22]张 当,郝立新. 共同富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之辨[N]. 光明日报,2022-4-18(015).
- [23]王 名,蓝煜昕,王玉宝,等. 第三次分配:理论、实践与政策建议[J]. 中国行政管理,2020(3):101-105.

The Third Distribu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Generative Logic, Mechanism and Significant Advantages

Liu Xuwen

Abstract: A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common prosperity has been the unremitting pursuit of the CPC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third distribu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n important path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tion logic, the third distribu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is an inheritance of Marxist wealth view, an effective connection of the theory of “getting rich before getting rich”, and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chanism, the inherent coupling between the two shows that for the third time,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omote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the whole people in making up for the lack of distribution,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culture of self-restraint and kindness, help build the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members, and achieve the full range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social equ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bvious advantages, the leading force of the third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CPC. Its fundamental purpose is to take the people as the center, and its ultimate goal is to achiev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The Third Distribu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Voluntary Act; Distribution System; Significant Advantage

责任编辑:刘宇浩
收稿日期:2022-10-19